

## 從紅樓夢研究說到曹雪芹的反理學思想

車潤孫

關於紅樓夢本書及其作者的研究討論，論文和撰著已有很多。如果撇開蔡元培的研究不談，成績最卓越的，應當推王國維、胡適、周汝昌和趙岡夫婦幾個人。雖然首先說紅樓夢出於曹雪芹之手不是胡適，而詳細考證確定了曹雪芹著作權，則不能不推胡適為功臣之首。順着胡的路綫，聚集許多版本校勘紅樓夢，俞平伯也作了不少工作，其勤勞應當受人重視。在胡之後，對於紅樓夢作者的研究，最有貢獻的是周汝昌，他的紅樓夢新證將曹雪芹的家族世系以及曹家的權勢富貴和當時政治關係考證得清清楚楚，成績超出胡適、俞平伯等人以上，其中多半是由於鄧之誠的啓發。<sup>1</sup> 後來周氏又寫成曹雪芹一部書，可稱之曰曹雪芹傳，它的基礎雖建立在紅樓夢新證上，而比起新證卻更進步更成熟。趙岡夫婦對於周氏之說頗多修正，其成就極有價值。至於紅樓夢的文學研究，筆者見聞淺陋，直到今天，似乎還是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高踞首座，無有能出乎其上者。近十幾年來，大陸上說到紅樓夢撰著時代的社會背景以及曹雪芹著書主旨的文章，多到不可勝數，因此不僅胡適、俞平伯等人受到攻擊，就是周汝昌的著作也不能流行。筆者在這裏不詳舉大陸上的學人所討論紅樓夢撰著時代社會背景是如何說，只是就個人對當時皇帝統治人民思想的方法畧加闡述，企圖對於曹雪芹著書宗旨有所探討發明；許多材料和問題的啓發，別人過去所作的研究給了我不少方便，尤其是周汝昌。如果拙文稍有可供參考之處，那只是我的研究方向和注重點和別人不同而已。

賈寶玉誠然不是玉璽，紅樓夢書中也決不存在着反清的民族思想，只要承認紅樓夢

1 鄧之誠的中華二千年史第五冊中清史部份，關於清康熙乾隆時代聖祖高宗游幸的耗費，講得比孟森的清代史正確清楚。

是曹雪芹作的。我們應當想到蔡元培撰寫石頭記索隱，是在排滿意識仍盛時代，難免有所偏蔽。胡適紅樓夢考證比索隱進了一大步，誰也無從否認。不過胡適認定紅樓夢是曹氏的自傳，要以曹氏家庭中人物故事和紅樓夢中的人物故事相比擬，求其符合，則是胡適紅樓夢考證所引起的魔障。這一個缺點雖然比起索隱猜謎，沒有那麼嚴重，但陷入刻舟求劍的泥淖中，以致有許多問題看不清楚，阻礙紅樓夢研究的發展，胡適、俞平伯等人應當受批判，客觀地說確有道理。曹雪芹不能憑空寫小說，其中有他自身經歷和他所聽到的、見到的故事，當然包括他的家族、親戚、朋友以及當時執政者措施在內，文學家創作的取材都是如此。所以周汝昌作的紅樓夢新證雖是追隨胡適的路線，而其書對於紅樓夢的研究，卻有其不可否認的價值，即在於他將著書重點放在搜集曹雪芹本人及有關係人物的歷史上，這是極有助於人們研究紅樓夢的取材。在新證中，周氏還是走入歧途，他花費了許多氣力將曹、賈二家的人物互相比附。等到他所著曹雪芹一書刊行，這些觀念就減輕好多，這是他個人的一大進步。關於紅樓夢不是曹雪芹自傳這一判斷，趙岡夫婦曾說過，並且說曹雪芹故意安排了許多虛偽的佈局與錯綜穿插，但說是曹家四個人的回憶錄，<sup>2</sup>則頗有語病。我的朋友徐復觀有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很有些新見。<sup>3</sup>我在這方面不用多說，只提出曹雪芹塑造出若干人物，以表現他的理想，構成爲一部小說，並且借寶玉之口，說出一些他要說的話，這些看法而已。

曹雪芹的生卒年月，許多人花很多氣力去研討，這一熱鬧的考據論戰我不想參加。他的卒年不是壬午便是癸未，壬午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癸未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祇有一年之差。何況曹雪芹如死於壬午除夕，照陽曆算已是1763年的二月十二日了。最成問題的是曹氏的生年，有說他生於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的；有說他生於雍正二年甲辰（1724）的，<sup>4</sup>其中關鍵，在於說他歲數小、生的晚，便不能親見曹家的繁盛，於是不能不想法使曹家中興一次；何況更因爲曹氏自傳一說之故，要將賈寶玉當作曹雪芹的化身，除了他是否曹顥遺腹子之外，小說中貴妃賈元春的生年也成爲考證曹雪芹生卒年的有力論證。我覺得我所要討論的問題，和曹雪芹生卒遲幾年或早幾年，都沒有甚麼關係。他可能沒有親自享受到曹家興盛時期的榮華富貴

2 趙岡陳鍾毅：紅樓夢新探頁181、189—214。文藝書屋1970印本。

3 刊載明報月刊69期，拙文執筆時尚未出版。非雪芹自傳之說，平日相談，拙見與徐君同。

4 周汝昌撰曹雪芹頁230—233。1963，作家出版社本。

生活，他難道不能聽到旁人或家裏人述說過去的興盛狀況？人們口口聲聲恭維曹雪芹是大文學家，而不承認他有豐富想像力，也不許他運用聽來的素材加以渲染改變，勾畫成爲小說，豈非怪事？如果要我選擇，只有暫且採用他的卒年癸未（1763），生年乙未（1715）之說。這與周汝昌所考不同，也表示我對於周汝昌在曹雪芹書中說曹家會中興過一次，並不同意。<sup>5</sup>

曹家是內務府包衣人，從康熙二年（1663）曹璽作江寧織造起，其後曹寅曹顥曹頤都作過，其間曹寅並且兼任兩淮鹽政，直到雍正六年（1728）曹家被籍沒，曹家享有六十多年的富貴榮華，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康熙時代皇帝南巡的供應，以及平日宮中的用度，皇室中人物及侍衛近臣們的需索，曹家都要打點孝敬。這些款項的來源當然由曹家去想辦法，有些是織造和鹽務會計上得到皇家許可的開銷，有些是額外的花費。曹璽的妻子孫氏是康熙皇帝（清聖祖玄燁）的保姆，曹璽因此得到康熙皇帝格外寵信，派他到江寧作織造，替皇帝弄錢採辦，並且兼任特務。當然這是可以從中賺錢的好差事；然而不能公開報賬的開銷，佔其中大部份。除了向商民搜括以外，祇好算在曹家自己的賬上，以致有了虧空。在康熙時代，曹家在皇帝諒解之下還要想辦法彌補虧空；到了雍正時代，從前保姆關係早已完了，皇帝想到包衣人曹家在江南享盡榮華富貴六十多年，這樣賺錢的好差事，居然還有虧空，能不赫然震怒？於是有抄家籍沒之舉。<sup>6</sup>這事發生於喜歡抄大臣之家的雍正皇帝手中，<sup>7</sup>未必一定與甚麼爭奪皇位的事件有牽連。<sup>8</sup>康熙皇帝南巡用了不少地方上的錢，還嘴裏說得很堂皇，自認沒有消費民力物力。<sup>9</sup>這段歷史埋沒多年，甚至近代有名的史學家還信以爲真。<sup>10</sup>曹家忘記不了他們所受的冤枉，如果說曹雪芹作紅樓夢是有意反映這些，應當是正確的看法。

前面所說，祇是曹雪芹憎恨清代統治者的原因之一。他對於統治者所提倡的理學，更深惡痛絕；而作八股文去應考，爲博取功名富貴，以屈身於科舉制度之下，是他所唾

5 關於曹氏生卒年的考證，見周汝昌曹雪芹頁230—233，趙岡夫婦紅樓夢新探上冊頁27—29。

6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頁413—420，曹雪芹頁26—29。永憲錄續編頁390。

7 永憲錄卷四頁289。

8 周汝昌曹雪芹頁30、31、34、35，將曹氏抄家和雍正奪位事件結合在一起。

9 王先謙康熙東華錄卷21頁40B暨雍正東華錄卷四頁40B。台灣文海出版社影印本，下同。

10 孟森清代史頁140、150。周汝昌曹雪芹頁211—218。

棄卑視的行為。因此在紅樓夢中表露出這一套反統思想最為尖銳明顯，他將寶玉寫成那樣反對科舉，不去作祿蠹，正是要顯露他自己的志願。如果將這一套思想和吳敬梓撰儒林外史相提並論，認為他的反對八股取士，只是要讀書的人們不去攻讀時文制藝，在觀點上就發生相當謬誤。吳敬梓還要發揚儒家的詩書禮樂的教化，去祭祀太伯祠，而賈寶玉則讀南華經(莊子)。當然受着時代和環境的局限，他不可能另闢新途，脫離儒家後只好逃歸釋道；因為他無從知道還有一條反理學的漢學途徑，既然反程朱，索性連孔孟都不談。周汝昌用了很多筆墨在曹雪芹一書中，介紹明人呂坤思想，<sup>11</sup>說呂與朱熹思想是如何的相反，以說明曹雪芹在紅樓夢第一回會說人生由於所秉之氣不同因而賢愚邪正不同，證明曹氏反朱的理論與呂坤之說相近。周氏這一說用來證明呂曹二人論人生氣稟的見解確有相合之處，也恰與朱之說歧異，但缺乏直接證據，指出曹氏研讀呂坤的書。周氏既未說曹氏必定受呂坤影響，也就無須多加辯論。我們不要忽畧，呂坤雖反朱，並未脫離儒家；曹氏則逃入釋道，不談孔孟，似乎不能從論人生氣稟一點的偶然相合，說他為呂坤的同調。曹氏是不曾見過惠棟、戴震，也不可能讀到他們的著作；然而他的反理學和惠戴是一樣的。這不是甚麼階級問題、種族問題，而確是由於反對統治者運用理學思想以管制天下臣民。

清代從康熙皇帝起就提倡理學，既講求實踐又去著作，大事宜揚；大臣中出現了不少理學家，熊賜履、李光地、魏裔介、魏象樞，湯斌、張伯行等人，真是指不勝屈。過去我和別人一樣地恭維他，認為他極為難得，真是個躬行實踐的理學皇帝。<sup>12</sup>等到我看到他給曹寅李煦的硃批，至少我明白兩點：（一）他用特務，命曹寅探聽熊賜履到底是否有錢？臨終有何言語？<sup>13</sup>熊是講理學的，是他的近臣，而他還是猜疑防忌，那有這樣的理學家？（二）放款給鹽商或臣下去生息，這一件事牽涉很廣，我在另一文中再詳細討論。康熙三十九年四月李煦在蘇州織造任內上奏摺說：<sup>14</sup>

昨聞皇上復念及包衣下人資生艱苦，特給內帑借給營運，利息從輕，俾足以仰事

11 曹雪芹頁55—63。

12 孟森清代史頁162—174。

13 文獻叢編第九輯康熙硃批識旨，頁2 B至頁3。

14 文獻叢編第二十九輯蘇州織造李煦奏摺，頁5 B至頁6。

俯育，得以盡心效力，此真天地父母愛養之心，亘古所未有者。（中略）情願借銀壹拾萬兩，營運資生，以圖報效。但臣煦遠在蘇州，不能按月交還。議以每年還本利銀壹萬壹千兩，就近交與江蘇布政司庫內，逐年彙解，十年全完。則上不虧皇上之本，下可以養家口，臣亦得以從容辦事。感沐深恩，寧有既哉！

李煦是包衣人，作蘇州織造，康熙皇帝知道他有財經手，可從中圖利，於是肯定要放欸給他，以便借此剝削。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江寧織造曹寅上奏摺說：<sup>15</sup>

去年聖駕南巡，蒙恩賞借兩淮商人庫銀一百萬兩。臣訪問商人祇實得八十萬兩，其中又有非商借名領去者，臣不勝驚異。

兩淮鹽商從此以後每年要繳納的欸項就增多帑利一項。等到道光年間陶澍整頓鹽務，竟不知這筆錢始於何時。<sup>16</sup>這是內務府經費來源之一，<sup>17</sup>而不願意正式公佈，就因為不能公開說出皇帝放欸。鹽商有永遠償還不清的債務，<sup>18</sup>造成鹽價上升原因之一，禍國病民的弊政竟出於這位理學皇帝之手。曹寅說出鹽商並未實收一百萬兩，康熙卻祇批知道了，而不追究，也是頗耐人尋味的事。<sup>19</sup>

康熙皇帝不過個人作為，冒充一個講理學明君而已。他的兒子雍正皇帝（世宗胤禛）便變本加厲用理學來統治天下的臣民。自己作假理學家不過是沽名，其害處尚小，用理學作工具來統治天下，則害及於天下每個人，禍乃至於防不勝防。因為法律要以人的行為來判斷，須要以事實表現作根據。何況無論何種法律均須有條文規定，要事先公佈。縱然殘暴，人們還可趨避。講到天理人慾，則祇講人心術的好壞，極難找到標準，要看統治者的喜怒而定。雍正皇帝用天理良心來教訓人，指責人的心術如何，居心如何，與後世統制思想政策極為相似。在雍正元年正月，即他登基後三個月，頒佈諭旨十一道給

15 文獻叢編第十輯康熙硃批諭旨，頁11。

16 陶文毅公全集卷十七「淮南乙未綱引課仍請分帶摺子」。清史稿卷一二九「食貨志」。

17 總管內務府則例廣儲司卷一頁27。

18 同注17，及文獻專刊李德啓「清季內務府經費問題」。

19 很可能為南巡的隨侍人員，從中作弊，康熙皇帝明知而不問。

總督、巡撫及州縣等官。<sup>20</sup>在給總督的諭旨中說：

朕視天下如一家，視臣鄰如一體。爾等亦宜深體此意，以一家之心視兩省，以一體之心視屬吏。

在給提督的諭旨中說：

居心多慾，自難彈壓下僚。

在給總兵諭旨中說：

文武職任雖分，盡心王事則一。彼此和衷，同心共濟。（中略）上下一心，忠義自奮。

在給布政司的諭旨中說：

爾以無私自信，督撫自不以私心自疑。

在給道員的諭旨中說：

今以獻賂為實，虛譽為名，動云名實兼收。內以欺己，外以負國。有靦面目，其何以立身而抒忠蓋乎？

在給知府的諭旨中說：

朕繼承大統，夙夜祗懼，惟恐有負皇考付託之重。深冀爾等各體此意，精白乃心，以古循良自勉。

雖然他是在勵精圖治，要改革康熙時代的寬容官吏貪污風習。細讀這十一道諭旨，顯明地側重做官的居心，諄諄告囑他們端正心術。雍正元年二月庚申諭旨說：<sup>21</sup>

<sup>20</sup> 均見清世宗實錄，此據王先謙雍正東華錄卷一頁9—13。

<sup>21</sup> 王先謙雍正東華錄卷一頁18。

爾諸臣，理宜感發天良，靖共爾位。（中略）爾等果能悔改惡習，竭力供職，一二年後，必有誠於中而形於外者，朕自必知之。

結合前面所引正月發佈的諭旨看來，他所談的全是大學裏正心誠意之說，也就是理學家修身的功夫，不過理學家是用以修己，清世宗卻用以修人而已。雍正元年四月諭滿漢文武大臣詔中說：<sup>22</sup>

天、君、親，大義也。（中略）以君之好惡為好惡，然後人人知改其惡，而遷於善。君臣一心，國之福也。傳之萬世。亦有令名。

原來他所說正心，是要人和他同心，他所謂好惡是他的好惡，同於他好惡便是善，否則便是惡。如果不看見這條諭旨，祇聽他講理學勸人為善，有何不好？雍正元年十一月甲申大學士等檢舉誤票京口將軍本章，請交部議處。得旨：

忠君愛國之心發於至誠，凡事自不至舛錯遺漏。（中略）朕之所望於大臣者，於一切利欲之心勉自克制。精白乃心，維持國家大體統，不使我朝君臣貽譏於萬世，朕之所望足矣。<sup>23</sup>

理學家主張去私慾，存天理，雍正皇帝要求大臣克制利欲之心，本不能算誤謬，但他所要求的是和他一心。既說：

當令舉國內外共為一心。既為一心，則是非與予一人同之。<sup>24</sup>

又說：

務期君臣一德一心。同好惡，公是非。<sup>25</sup>

最重要的是他所撰的朋黨論，說：

22 王先謙 雍正東華錄 卷一頁24 B。

23 雍正東華錄 卷一頁42 B。

24 雍正東華錄 卷二頁17 雍正二年五月壬戌諭。

25 雍正東華錄 卷二頁25 雍正二年七月丁巳諭。

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為人臣者，義當惟知有君，則其情固結不可解，而與君同好惡。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而上下交。乃有心懷二三，不能與君同好惡，以至上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則皆朋黨之習為之害也。夫人君之好惡，惟求其至公而已矣。（中略）故虛其心以博稽衆論。然必衆論盡歸於至正，而人君從之，方合於大公。若朋黨之徒挾偏私以惑主聽，而人君或誤用之，則是以至公之心，反成其為至私之事矣。（中略）我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年，用人行政邁越千古帝王；而大小臣僚未能盡矢公忠，往往要結朋黨。聖祖戒飭再三，未能盡改，朕即位以來，屢加申飭，而此風尚存。<sup>26</sup>

在康熙時代明珠、余國柱、徐乾學等人勾結貪污是很著名的事件，但那是康熙二十七年的事，久成陳迹。雍正皇帝撰朋黨論的主旨，想是因為康熙末年諸皇子爭奪帝位，各有朋黨，世宗胤禛得到帝位之後，要每個人都效忠於他，於是極力攻擊朋黨。如祇為此，尚可原諒。但他說人君之心惟求其至公，所以要人臣以君之心為心；而說到如何才能至公，他說虛其心博稽衆論。他如何博稽衆論？則是沿襲他父親傳下來的的方法，命內外臣工各具密摺奏事，而組織更加周密成為全國性的特務網。看那些刊佈的雍正硃批論旨，就可以明白，當時大小臣工的一舉一動他無所不知。這是博稽衆論嗎？御史奏章則不見被他採納，有時且被指為朋黨。如謝濟世參田文鏡，謝濟世便被指為和李紱是朋黨，<sup>27</sup>因為田文鏡是他作雍親王時的王府莊頭，<sup>28</sup>真是他嫡系心腹死黨。所謂虛心者何在？所謂至公者何在？他援引天尊地卑之說，比附解釋君臣為天然生成的階級，命天下人民順從他。這種運用儒家理學的方法，不僅使程朱為之服務，孔孟也成為他的工具。謝濟世注釋大學，以毀謗程朱得罪，程朱的學說既是他統治天下的工具，所以不能毀謗。雍正皇帝更進一步說：

朕觀謝濟世所註之書，意不止毀謗程朱。乃用大學見賢而不能舉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註有「拒諫飭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

<sup>26</sup> 雍正東華錄卷二頁25 B。

<sup>27</sup> 雍正東華錄卷四頁55—56雍正四年十二月甲子及乙丑。

<sup>28</sup> 批本隨園詩話上册頁15 B。



甚矣」等語，觀此，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朕即位以來，於用人之際至公無私，不惟可以自信，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sup>29</sup>

雍正皇帝要人同他一心，因為他的心是大公無私合於天理的。謝濟世因參田文鏡得罪，他怕謝說他的心不公正。這種說法可以搖動人心，所以一定要將謝問罪。

雍正皇帝時常用天人感應之理教臣下，要人們向他效忠，他說：

人臣事君，尤當至誠不欺。若稍存欺心，便是獲罪於天。（中略）即在為君者亦然，但存心合乎天理，雖有一二無知之輩，肆為怨謗，久之，天下後世自有公論。

明白地說他存心合於天理。他又說：

數年之中，蒙上天鑒察朕心，每逢祭祀典禮，或先期風雨，或過後陰寒；而本日行禮之時必晴霽暄和。此萬耳萬目所觀瞻，歷歷不爽者。天道至公，惟佑善人。一念善，天賜之福；一念不善，天降之災。（中略）順理而行，此所謂誠也。（中略）不愧屋漏，無慚衾影，處處可以對天，則不善之念何自而萌乎？既無不善之念，則是一身之中，方寸之內，有獲福之基，無招禍之理，焉有不荷神明之默佑，而順適暢遂者？<sup>31</sup>

用祭祀行禮不遇風雨證明他是無不善之念的人，所以荷天之福。既然他是順理而行，所以他的心合於天理，人們要合於天理就要聽從皇帝的話。宋儒去人慾、存天理的思想，竟然被雍正皇帝這樣地非常巧妙靈活的篡奪過來。

他的兒子乾隆皇帝（高宗弘曆）即位後，繼續的嚴厲統制思想，仍然運用理學。根據歷史記載，乾隆皇帝的統制思想，和他父親並無顯著差別。曹雪芹撰紅樓夢所反對的理學思想，上面所引的已足以說明，所以在這裏不敘述乾隆皇帝如何運用理學思想統治臣民的諭旨和事迹。

29 雍正東華錄卷七頁26雍正七年六月辛丑。

30 雍正東華錄卷七頁33雍正七年七月辛未。

31 雍正東華錄卷七頁56 B 雍正七年十一月癸酉。

雍正皇帝為取得帝位，有謀父、屠弟之嫌，他雖在大義覺迷錄中自己闢謠，但無法使人相信？何況功成後將年羹堯賜死，囚禁隆科多，對於出力謀奪帝位的私黨，是如此的無情。雖口口聲聲愛民，杜絕貪污，而他「好抄人的家」何嘗不是為了要大臣之錢？雖然他自己也說是流言，而事實具在，不容否認。<sup>82</sup>從雍正朝關稅史料看，<sup>83</sup>雍正時候，內務府用的錢許多是從關稅下想辦法，和他父親在鹽商身上打主意一樣，祇是對象不同而已，其為好貨則一也。<sup>84</sup>而抄家取財的行為，他兒子乾隆皇帝作得比他更凶惡，剝削的方法越來越厲害。雍正乾隆這樣貪暴皇帝卻在那裏講理學，曹雪芹如何能信服？

戴震撰孟子字義疏證是針對雍正乾隆兩代以理學統治天下而作，章炳麟的著作中幾次說到這事。我另有一文要討論到清代雍乾兩代統制思想和學人們的反理學。<sup>85</sup>說到曹雪芹，人們從紅樓夢的敘述和描寫中，很容易知道他不贊成學八股，不熱中於功名富貴。至於曹氏的工詩善畫，周汝昌、吳恩裕等已發揮得很多。<sup>86</sup>從學術修養上說，他的程度似乎並不高，他既無深厚的經史小學的根柢，對於佛經道教之說也沒作過深度的探討。為了反抗統治者的提倡理學，逼得他要拋開儒家，紅樓夢一開端就是用僧道兩個人點化一塊頑石成為寶玉，消極說明他不是儒家。另一要點是這塊頑石為女媧氏補天所剩下的，「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既然皇帝的心合於天理，皇帝就是天，羣臣輔佐皇帝就有補天之功，獨他不去，這就是他將寶玉說作補天剩下的頑石的原因。後來動了凡心還是想去，而僧、道告訴他：「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從這些話看來，曹雪芹顯然是感到統治者的慘酷而淡泊於名利，因此逃儒而入於釋道。何況不僅雍正皇帝刻薄寡恩，就是乾隆皇帝又何嘗待人有半點忠厚？只看他對張廷玉要求配享和告老的事辦得如何尖刻，就可以證明。<sup>87</sup>他所說「樂極悲生，到頭一

32 雍正皇帝奪位事，見孟森世宗入承大統考實，清代史頁477—510。永憲錄載雍正時抄家事多於實錄、東華錄。

33 文獻叢編第十一輯、十七輯、十八輯、十九輯。

34 這並不是說他放棄剝削鹽商。

35 文載新亞學報十卷一期，在印刷中。

36 周汝昌：曹雪芹；吳恩裕：有關曹雪芹十種、曹雪芹的故事。

37 清史列傳卷十四頁24B—34，事在乾隆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

夢，」是他看穿統治者假面具的話。曹雪芹的著書主旨，他自己明白說出，他說：

因見上面雖有些指佞責奸，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世罵時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有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實非別書之可比。雖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一味淫邀艷約，私訂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鈔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sup>38</sup>

曹氏深恐召惹文字之禍，一再聲明是「稱功頌德，」「毫不干涉時世；」說明著書的主旨在於談情。談情而不淫，又不奉儒家之教去作官事君，所以改號「情僧」。僧人是無君臣之分的人。又在第二回中敘冷子興轉述寶玉的話：

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兒是泥作的骨肉。我見個女兒便清爽，見了男人便覺得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雨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者，不能知也。<sup>39</sup>

這一段話很重要。第一，他指出女人可愛而討厭男人，這並不是因為女人受壓迫，在曹雪芹時代不可能有此思想，而是由於女人不用應科舉求功名去作官，也無須趨炎附勢，更不用板起面孔講道學，或勾結權貴擅作威福，或去作卑鄙貪污的事。當時所有害人作壞事的，上自皇帝，下至胥隸，全都是男人。曹雪芹說女人是水作的，意思是清白純潔；男人是泥作的，意思是黑暗污濁。第二，他談情，是針對着雍正乾隆皇帝講天理。他沒有如惠棟戴震那樣說人慾不是與天理相對待；而指出天生人有兩種不同之氣。他說：

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爲之世，清明靈秀之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爲甘露爲和風，泠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於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於大壑之內。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畧有搖動

38 甲戌本石頭記卷一第一回頁8。

39 甲戌本石頭記卷二第二回頁9。

感發之意，一絲半縷悞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遇正不容邪，邪復妬正，而兩不相下；亦如風火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為大凶大惡。置之萬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不偶，生於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亦必為奇優名娼。<sup>40</sup>

他將人生的氣稟分為清明靈秀和殘忍乖僻，和朱熹說人有氣質之性，義理之性，持論相近，這一點周汝昌已指出。<sup>41</sup>拙見則以為清明靈秀似指人心中合於天理者而言，殘忍乖僻似指人心中偏於人慾者而言。以曹雪芹的學識程度而言，他所想到的似乎只能到這個境界。他認為有的人是秉清明靈秀之氣而生，有的人是秉殘忍乖僻之氣而生，在降生時善惡便已判然兩途，於是理學家所提倡正心誠意以修身的功夫便無所施其技了。這明明是反理學的說法。賈寶玉則是混合兩種之氣而生的，要作情痴情種高人逸士，而絕不受庸人驅使。換句話說，無論環境如何，也不會改變生來之氣。不論其是否接近朱熹的某一部份持論，或者與呂坤之說暗合；卻表示出他所塑造的寶玉是情種情痴高人逸士，反映出雪芹的思想。不作官，是不願受庸人驅使。不接受聖賢教化，是生來的乖僻邪謬不近人情。如果這時沒有雍正乾隆兩個皇帝之提倡理學，他這些話似乎只為對付村學究、迂夫子有頭巾氣的人而發，就不值注意。看了前面所引雍正皇帝的議論，才恍然明白他是針對着當時統治者而言。他罵統治者是庸人，但他用「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作烟幕來掩護。既暗示自己是「聰俊靈秀」，又是「乖僻邪謬」。厭惡男人的污濁，稱贊女人的純潔，女人若是愛權貪財的，如王熙鳳之流，他同樣加以貶斥。他知道歌頌女人，別人一定以為他是淫魔色鬼，因此他首先聲明，指出「若非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者，不能知也。」果然紅樓夢流行之後，確曾被人視為淫書。<sup>42</sup>一直到今天沒人勘破他之所以談情，所以談女人，是針對着當時統治者運用理學統治天

40 甲戌本石頭記卷二第二回頁9B—10。

41 周汝昌：曹雪芹頁59。

42 梁恭辰、英浩等均有此說，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第一冊卷一頁14—16。

下。何況他在書中對於賈家別的男人淫蕩故事，有露骨的描寫。在他筆下，寶玉以外，只有焦大柳湘蓮等人有正義感的男人，而柳是個戲子，也是有情而不淫的人，焦大是個奴僕。既說明情之不同於淫，又一再解釋他不是如世之好淫者，而是意淫。他說：

「意淫」二字，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sup>43</sup>

以現代的語言來解釋，「意淫」即「精神上的愛」，也可用「靈的愛」來代替。曹氏時代沒有這類詞彙，於是創造「意淫」一詞，還費力去解釋一番。道學家看見淫字，就更有所借口指為淫書了。到了今日，雖然紅樓夢已不再被視為淫書，而他真的著書主旨何在，卻一直被埋沒，甚至遭受到曲解。

紅樓夢一書，對於抄家之痛一定描寫得很詳盡，但他成書在乾隆時代。乾隆時代抄家之流行不亞於雍正，殘酷情形如果被描畫出來，一定觸犯忌諱。抄家的故事敘述在八十回以後，紅樓夢一書，在曹雪芹逝世以前，可能已完成了一百二十回的絕大部份，縱有小部份等待修補，斷不會八十回以後完全被人傳抄遺失，而自己毫無底稿存留。趙岡陳鍾毅著的紅樓夢新探下篇專討論後四十回。他們說續書人不是高鹗，<sup>44</sup>而且續書人故意要改寫後半部，可以免得使作者的親人遭受文字獄的構陷。他們又說八十回以後未曾公開被傳抄，是因為它有不便公開之處。<sup>45</sup>都是合理的見解，我甚為贊成。裕瑞棗窗閒筆說：「曹雪芹雖有志於百二十回，書未告成即逝矣，」很可能是誤信別人的烟幕。後四十回諷刺統治者或者有些露骨，傳抄的人都會害怕，收藏閱看的人也可以因之惹禍。瞭解乾隆時代文字獄的情況的人，對於弘晬批永忠弔曹雪芹的詩說，「紅樓夢非傳世小說，余聞之久矣，而終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也，」<sup>46</sup>其意義是甚麼，誰都明白。永忠這首詩作於乾隆三十三年戊子，<sup>47</sup>其年上距曹雪芹之死不過五年，雪芹撰紅樓夢有諷刺統治者之意，可能還有些人知道，所以弘晬如此云云。有人將礙語解作綺語，真堪絕倒。<sup>48</sup>從後四十回之不流傳，也可以窺見曹雪芹撰此書的一部份動機；但如果專從抄家

43 甲戌本石頭記卷五第五回頁17。

44 持此說者，尚有別人，非始於趙陳二氏。說改寫動機，為避免惹禍，則始於他們。

45 紅樓夢新探文藝書屋1970年7月出版，其說見下篇頁370、374—375。

46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第一冊卷一頁10。

47 據紅樓夢新證頁454。

48 燕京學報十二期，侯謬「永忠年譜」。

和文字獄來講，則不能接觸到曹氏反對統治者用理學來治天下、來殺人的著書主要宗旨。

清朝有一部小說，處處和紅樓夢反對，即兒女英雄傳是也。書中的主人公不特要去應科舉，得考中探花，並且大講其理學。全書思想不外乎去私慾、存天理、忠君敬天、發揮正心修身的道理。以這一套理論來和紅樓夢相比較，就可以知道兒女英雄傳作者文康之反對紅樓夢，正因為文康是清代統治者的崇信者，所走的是在理學統治時代的人，討好皇帝應走的正路，而曹雪芹則是那個時代的叛徒，不服從統治者的號召。這是他能成為偉大的文學家的主要原因。但如果說他有今人階級鬥爭觀念，則似乎有些過份。

一九七〇年四月廿七日，講於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中國語文學部。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日，寫定。

## Notes on Studies on *Hung-lou Meng* and Ts'ao Hsüeh-chin's Anti-Neo-Confucian Attitude

(A Summary)

MOU JUN-SUN

Commenting on past studies on *Hung-lou Meng* by Chinese scholars, the present author agrees with the theory that the novel was created out of the author's personal experience, information from other sources, and imagination. It is partly autobiographical and partly imaginary. The present author wishes to point out furthermore the novel's anti-Neo-Confucian attitude and to discuss its mental causation.

The Ch'ing emperors, from K'ang-hsi, through Yung-chêng to Chien-lung, were enthusiastic patrons of Neo-Confucianism. Neo-Confucianism is the kind of philosophy whose main concern is man's moral life to be attained through knowledge and self-discipline. Both Yung-chêng and Chien-lung made use of Neo-Confucianism as a rationalization to justify their arbitrary rule over their subjects and the people. That is, they employed ways of self-discipline to discipline others and made themselves self-righteous. Both the emperors acted very much like a modern authoritarian despot. There were persons at that time, such as Hui Tung, Tai Chên and Ch'ien Ta-hsin, who in their writings expressed their refutation of the ideas behind such a rule. The present author has another article, which will be published in *New Asia Journal*, Vol. X, No. 1, discussing the teachings of these Ch'ing scholars. Ts'ao Hsüeh-chin, the author of *Hung-lou Meng*, was very much like these Ch'ing scholars in his disgust against the way in which the Ch'ing rulers were holding the nation in absolute subjection, as well as its rationale, Neo-Confucianism. The main plot of *Hung-lou Meng* is erotic love. It is obvious that the author meant to oppose love, which was human lust in the Neo-Confucians' view, to heavenly ordering (*tien-li*), which was said to be divine and must be obeyed. The hero of the novel extolled wholeheartedly the female sex, which was said to be made of water and therefore pure and clean, and scorned the male sex, which was said to be made of mud and symbolize filth and darkness. It can be understood that, as a result of his disgust toward the hypocritical and autocratic rule of the Ch'ing emperors, the author of the novel was disgusted also with the persons in power under this rule, who were all men. The same reason also explains why the hero of the novel was so disdainful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founded upon the tenets of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government officialdom created out of the examination.

Since this article is supplemented by the present author's other article mentioned above, reference to that article is recommended.